

信息空隙弥合与FDI区位选择^{*}

李四海 李 震

内容提要: 深入理解 FDI 区位选择对我国持续推进外商投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 285 个地级市 450 多个细分行业的外商注册数据,研究了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 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了 FDI 流入,其主要机制在于公共数据开放缓解了 FDI 企业外来身份的公共信息劣势,具体表现为降低了 FDI 企业的经营性信息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公共数据开放后,FDI 企业在华开展更广泛的经营业务,并降低了受到行政处罚的概率。开放的数据内容质量越高、平台建设越完善、政府政策保障越强,其 FDI 引流效应越强。进一步研究表明,公共数据开放改变了 FDI 进入的股权配置和空间选择,在股权模式上更倾向于以独资(而非合资)身份进入,并降低了同业集聚倾向。公共数据开放对 FDI 的引流作用超出了其直接效益,表现为同时强化了当地资源型和制度型区位优势对 FDI 的吸引作用。本文的研究系统阐释了公共信息环境对 FDI 区位选择的重要塑造作用,为中国制定吸引和利用外资政策提供了现实参考,同时为政府推动释放公共数据价值潜能提出了新情景。

关键词: 公共数据开放 公共信息环境 外商直接投资 外来身份劣势 进入模式

作者简介: 李四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教授、滇西应用技术大学管理学院特聘教授,430073、671000;

李 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研究生,430073。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25)09-0124-17

一、引 言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在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陈继勇、盛杨悒,2008)。进入新发展阶段,FDI 的功能定位已演变为构建双循环格局和开放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高管职场晋升经历与企业决策行为:基于行为经济学跨期选择理论研究”(7207218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企业碳中和承诺:治理效应、转型风险对冲与脱碳有效性研究”(72472160)。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李四海电子邮箱:lshhhy0420@163.com。

型经济新体制的关键。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纳入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体系。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强调将“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作为政策着力点,标志着中国外资政策进入制度型开放新阶段。当前中国正深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并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等多项重磅政策措施,综合提升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积极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保护外商投资权益。

由于地域、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外商投资企业必须承担东道国当地企业无须承担的额外成本,克服当地企业无须面临的经营障碍。归根结底,这种先天的“水土不服”可以主要地归纳为获取东道国公共信息的劣势(Mariotti和Piscitello, 1995),即缺乏有效了解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市场状况的公共信息。与外商开展海外经营可能需要的其他信息不同,当地公共信息由东道国产生并且经由不受外商控制的方式传播,外商不能直接提供也不能带入东道国。即便是拥有卓越管理能力、专业知识和技术经验的外商投资者,也必须面对东道国当地的公共信息环境状态。因此,相比于任何本地经济主体,外商面临由东道国当地公共信息可得性不足或缺失导致的更高成本(Javorcik等, 2011)。鉴于其重要性,在以往国际资本流动研究中,“信息空隙”(Information Void)通常被专门用来形象地描述东道国当地公共信息缺失的状态(Kingsley和Graham, 2017; Yang等, 2023)。

早在2015年8月,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及政府稳步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任务。近年来,已有200多个地级市上线公共数据平台,公布了政府等公共机构在履行公共职能的过程中产生的公共数据信息,涵盖政策法规、金融信贷、就业与劳动力市场、交通、环境、气象等不同领域,是一种规模可观、种类丰富且价值含量极高的数据信息资源(方锦程等, 2023)。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角度来看,公共数据平台的上线不仅有助于外商投资者学习当地的市场环境信息,降低日常经营中的信息成本,还有助于他们及时学习当地市场监管与政策法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于当地作为东道国优化公共信息环境、弥合“信息空隙”来说具有重要意义(He, 2002)。既有公共数据开放的研究主要探究了公共数据开放对本地经济主体或区域经济的影响(彭远怀、胡军, 2024; 方锦程等, 2023; 欧阳伊玲等, 2024; 王海等, 2024; 蓝发钦等, 2024),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东道国“信息空隙”弥合对于海外投资的实际影响。理论上,由于“外来身份劣势”的存在,FDI比本地经济体对当地公共信息环境的敏感程度更高(Goldstein和Razin, 2006; Kingsley和Graham, 2017)。本文从海外市场“信息空隙”弥合视角对FDI区位选择等问题展开深入探究,对于我国制定外资开放型政策以及开拓数据要素价值释放路径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利用地级市交错上线公共数据平台的准自然实验情景,本文研究表明,公共数据开放有效促进了FDI流入。机制检验表明,公共数据平台上线的FDI引流效应对信息敏感性行业以及在公共信息缺失更为严重的情境下更加显著,而且平台上线使FDI企业扩大了经营范围,说明公共数据平台上线降低了FDI经营活动中的信息成本;公共数据开放在市场干预较多的地区的FDI引流效应更显著,并且使FDI受到行政处罚的概率降低,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同时降低了FDI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了外商投资企业对当地市场规则的适应性。根据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发布的中国开放数林指数,本文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质量越高则对FDI的引流效应就越强,包括数据内容质量、平台建设质量和政策保证强度三个方面。接下来,本文对FDI进入的更多维度进行了研究。本文首先分析了FDI进入的股权配置模式,发现在公共数据信息可获取后外商增加了以独资(而非合资)进入的倾向,说明公共数据开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商对本国合作投资的依

赖。此外,集聚是FDI区位选择研究的重要概念,此前研究表明,外商为获取当地知识,会与其他FDI企业共址集聚(Filatov等, 2007; Yang等, 2023)。然而,集聚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成本和更高的技术外溢风险(Chung和Alcácer, 2002; Folta等, 2006)。本文实证结果发现,公共数据开放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同行外商企业的集聚倾向,说明公共数据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外商从同行集聚中学习当地知识的替代信息源,进而减少了集聚倾向。本文发现,公共数据开放对FDI的引流作用超出了其直接效益,还同时强化了当地资源型和制度型区位优势对FDI的吸引作用。

本文的研究贡献可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步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信息作为经济主体投资与生产的战略性投入要素地位被进一步强化,充分释放数据潜能也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社会共识和现实需求。当前对公共数据开放经济价值的研究主要关注本地经济主体或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叶永卫等, 2025; 方锦程等, 2023; 欧阳伊玲等, 2024; 蓝发钦等, 2024),忽略了外商这一对东道国的公共信息环境更为敏感的主体。本文首次将公共数据开放置于FDI理论框架情景,揭示了其在数字经济时代降低跨境投资壁垒、重塑国际资本流动格局的独特且关键作用,将已有研究视角拓展至国际资本流动层次。(2)为国际资本流动的“卢卡斯悖论”提供公共信息环境角度的解释。“卢卡斯悖论”指国际资本偏好流向资本回报较低的发达国家,而非回报较高的发展中国家(Lucas, 1990)。既有研究从政府监管、特殊生产要素缺失、产权制度、金融体系等方面的差异做出解释(Alfaro等, 2008; 陈六傅、刘厚俊, 2008),缺少对东道国公共信息环境的直接分析。本文借助中国各城市陆续上线公共数据平台的准自然实验情景,将公共信息环境质量纳入解释“卢卡斯悖论”和发展中国家吸引FDI的关键因素框架,提供了来自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因果证据。不仅显著区别于并补充了现有文献(Tan和Meyer, 2011; Meyer等, 2009),还为充分释放公共数据价值潜能提供了现实路径。各地在对外招商引资过程中,外资的同等国民待遇不仅需政策平等性保障,更需补齐其公共信息获取的能力短板,推动高质量公共数据开放代表了构建“信息赋能型”外资政策的重要路径,而且对本地区区位优势还具有显著的增益作用。(3)本文进一步揭示了公共数据开放对外资微观战略行为的深刻塑造。公共数据开放不仅推动外资减少对合资模式的依赖,转向更高控制权的独资模式,还降低了外资同业集聚获取当地信息的传统需求,以上拓展了外资进入的微观战略决策研究(Wei等, 2005; Deng, 2001),对高效利用外资具有新的政策启示。一方面,外商独资模式的增多要求政府加强与外商独资企业的合作与沟通,为其与本地企业、科研机构开展技术合作交流以及独立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提供可预期的安全合规环境和激励;另一方面,公共数据开放可以影响FDI企业的集聚倾向,以此为政策杠杆可以引导外资向特定区域或产业定向流入,增强对地方产业链和创新网络的引导能力,以此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与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政策背景与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政策背景与文献回顾

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经济迅猛发展,促使政府主动提供履行公共职能过程中产生的公共数据,赋予社会公众对公共数据的使用权,逐渐催生了“政府公共数据开放”的新理念。这一理念意味着,政府将行政过程中产生的原始公共数据作为新型公共品,并利用新技术将其无差别、主动地开放给公众,使数据资源得到高效流通和创新应用,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政府治理现代

化。总的来看,公共数据开放是数字时代政府治理与经济转型的战略选择与制度创新的集中体现。

总体上,我国公共数据开放经历了由早期探索到统筹推广再到机制成熟三个阶段。在早期阶段,北京、上海等地率先启动公共数据平台试点。随后,国务院于2015年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将加快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明确纳入国家政策文件。此后,中央与地方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和规划^①,提出构建统一规范、互联互通、安全可控的公共数据平台,并推动数据要素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治理能力、激活市场创新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2023年12月,国家数据局等17部门发布《“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提出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在应急管理、城市治理、绿色低碳等诸多方面的赋能作用。2024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明确以促进公共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为主线,推进授权运营、应用创新和产业生态繁荣,使公共数据在赋能实体经济、扩大消费需求、拓展投资空间、提升治理能力中发挥更加充分的作用。

在实施机制上,我国发展形成了“机构赋权—跨部门协调—技术支撑”的实施链条。在机构赋权层面,各地方设立数据资源管理局等专门机构,例如杭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和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负责公共数据平台的整体规划与管理,承担数据治理、资源目录编制、质量监管及平台运营对接职责,确保平台建设具备机构基础和持续动力。在部门协调方面,各级政府及公共管理机构共同承担数据采集、开放、审核与反馈机制,形成从“源头治理”到“开放共建”的协同闭环,依托多方协作机制打破了数据孤岛。例如,北京、苏州、济南等诸多地区构建了数据主题、政府单位、行政层级等多维一体的数据网络系统,通过数字技术平台,将多源数据汇总、调度、集成,形成模块化治理样式并对外开放。截至2025年3月,北京市公共数据平台已开放约1.8万个数据集,总计约71.86亿条数据。武汉市公共数据平台已开放超1600个数据目录,总计14100多个数据项和超过4545万条数据,显示了数据开放的广泛覆盖和深度应用。此外,多地公共数据平台不仅提供数据下载和API调用,还配备数据可视化、智能分析和风险预警等功能。公共数据的原始性、开放性及其平台可接入性使社会各主体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对数据进行加工、整合与创新应用,充分释放数据红利。

公共数据开放的潜在经济价值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关注。已有研究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在促进创新创业(陈艳利、蒋琪,2024;沈坤荣、林剑威,2025)、提振实体投资(叶永卫等,2025)、提高产能利用率(王海等,2024)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研究还发现,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了资本跨区域流动(彭远怀、胡军,2024;蓝发钦等,2024)。方锦程等(2023)将研究视角置于公共数据要素可得性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发现公共数据开放通过破除区域信息壁垒、弥合区域资源禀赋差距的作用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此外,研究还关注到公共数据要素的资产定价作用。欧阳伊玲等(2024)指出,公共数据开放通过降低投资者信息搜集成本和城投企业信用风险显著降低了当地城投债的发行利差。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表明,公共数据开放的经济价值存在于激发创业、鼓励投资创新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多方面,但这些研究的主体均属于本地经济体或区域经济体,尚无研究关注公共数据开放对外资的影响。在中国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的需求背景下,深入研究公共数

^① 如《“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

据对 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释放公共数据价值潜能,并为制定外商投资吸引政策提供思路。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新古典贸易理论预测,在投资回报率趋同前,资本应由富国流向贫国(Lucas, 1990);但现实中大部分 FDI 流向发达国家,即使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回报更高。传统解释集中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壁垒,如政治风险、资本管制、税收、法律和监管制度(Alfaro 等, 2008),但随着这些壁垒的普遍降低,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展现出友好姿态吸引 FDI 落户,FDI 仍倾向流入发达国家(Slemrod, 2004)。已有研究对此提供的一种解释是,这是 FDI 对与信息不对称相关的成本做出理性反应的结果(Ahearne 等, 2004; Goldstein 和 Razin, 2006):由于国际市场环境、法律与监管制度以及商业惯例等存在的巨大差异,在海外生产不仅需要支付建造实体生产设施的成本,还包括获取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市场状况等公共信息的成本。而这些公共信息获取成本在制度不完善、市场透明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中尤为突出,从而显著提高了进入成本,对 FDI 的流入形成抑制(Harding 和 Javorcik, 2011)。

Dunning(1977, 1981)提出的折中范式是许多国际生产理论的整合^①,对 FDI 的动机以及区位选择做了较为全面的解释。结合折中范式可以更为清晰地分析国际生产中的公共信息获取成本如何影响 FDI 区位选择。根据折中范式(Dunning, 1977, 1981),对外直接投资需满足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 and 内部化优势。其中区位优势包含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制度环境、资源禀赋等多个层面的要素。可以说,公共信息环境正是区位优势中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由于在公共信息收集与传播方面不完善,跨国企业在评估和把握投资环境时面临较大的信息搜索和处理成本(Ahearne 等, 2004)。这种高昂的信息成本使跨国投资决策过程不仅是对预期回报的简单抵扣,还必须综合考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额外风险和不确定性(Kingsley 和 Graham, 2017),因此更倾向于将资本投向那些公共信息充足、经营预期明确的国家。所有权优势可以使其在知识、技术等方面形成竞争力(Dunning, 1977, 1988),但要想把这些优势充分用于降低生产成本和提升竞争力,跨国企业必须在海外市场中拥有可靠的公共信息。例如,企业需要了解当地消费者的偏好、竞争环境和供应链条件,以及掌握有关政策变化、法律纠纷风险及监管要求的实时信息。当东道国收集和传播这些公共信息的表现较差时,所有权优势难以完全转化,FDI 流入将受到抑制。最后,东道国公共信息环境也可能影响国际生产的内部化策略。正如内部化优势所揭示的,跨国公司在国际生产中将其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可以增强战略控制、减少泄密风险、降低市场失灵成本等(Dunning, 1977)。而当面临东道国公共信息获取的高昂成本时,跨国企业往往需要通过合资甚至特许经营等非完全内部化方式来借助当地合作方私有的当地公共信息降低风险,这使内部化优势难以完全转化,从而抑制 FDI 流入。综上,东道国公共信息环境构成 FDI 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较差的公共信息环境会抑制 FDI 流入。

发展中国家公共信息环境质量较低,其根源通常在于系统性制度缺失(Makhija 和 Stewart, 2002),主动构建并优化信息开放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破解 FDI 流向悖论的关键切入点。公共数据平台构建了一个集成化、标准化、高时效的信息枢纽,系统性汇聚并开放了覆盖经济、社会、产业等多维度的关键公共数据,如区域经济指标、企业名录、物价数据、供应链图谱、基础设施分布、

^① 折中范式涵盖了要素禀赋理论、垄断优势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内化理论等主流理论。

物流效率、人力资源结构与技能水平、消费偏好大数据等(陈艳利、蒋琪, 2024; 方锦程等, 2023; 沈坤荣、林剑威, 2025)。这不仅为FDI企业获取日常经营所需的基础性信息提供了权威便捷的渠道,还为FDI企业进行精准市场定位、优化供应链布局、匹配人力资源需求、制定本地化营销策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决策依据,极大降低了其经营性信息成本与决策风险。FDI企业面临的另一重大挑战是制度性交易成本,这源于对东道国政府规则体系,包括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监管动态、行政审批流程等的不透明和不可预期(彭远怀、胡军, 2024)。既有研究表明,外资企业为应对此风险,往往与当地政府建立密切的政治联系,发展特权性接触(King, 2015),这不仅效率低下且易滋生寻租。中国的公共数据平台通过强制性、集中化地将分散于各政府部门的政策法规、办事指南、监管要求、审批进度等信息进行统一发布、权威解读和动态更新(蓝发钦等, 2024; 彭远怀、胡军, 2024)。这种平台模式显著增强了政府规则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和可执行性,从而有助于降低FDI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综上所述,本文预期公共数据平台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降低上述两类关键成本改善了当地公共信息环境,有助于折中范式中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及内部化优势的转化(Dunning, 1977, 1981),最终吸引更多的FDI流入。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城市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了当地FDI流入。

三、识别策略

(一)样本与数据

本文以2005—2021年285个地级市的FDI企业为研究对象。FDI企业注册信息来源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企查查平台,包括企业名称、注册资本、注册时间、行业信息、经营范围等丰富信息。为增加识别精度,本文参照狄嘉等(2024)等,将研究样本细分至城市-年份-行业层面,共涉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的450多个中类行业。城市层面的人口、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等信息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公共平台上线时间信息来源于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发布的《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城市)》^①(以下简称《报告》)。互联网数据中心数据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业务市场综合管理信息系统,5G专利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

(二)模型与变量

为实证检验公共数据平台上线是否促进了FDI流入,本文借鉴方锦程等(2023)等研究,设计如下多时点多维固定效应倍差模型:

$$FEntry_{i,j,t} = \beta_0 + \beta_1 PubData_{i,t} + CVs_{i,j,t} + v_{i,j} + v_{j,t} + \varepsilon_{i,j,t} \quad (1)$$

模型(1)中, i 、 j 和 t 分别代表城市、行业 and 年份;被解释变量 $FEntry$ 为外商投资企业新设数加1的自然对数;解释变量 $PubData$ 为公共数据平台上线的虚拟变量,根据《报告》,当城市 i 在 t 年上线公共数据平台取1,否则取0; CVs 表示控制变量组合,借鉴Yao等(2023)等研究,纳入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金融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同业外企密度等控制因素,捕捉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其他潜在异质性来源,具体如表1所示。在模型(1)中,本文还控制了城市-

① 详见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官网, <http://ifopendata.fudan.edu.cn/report>。

行业固定效应 $v_{i,j}$ 和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v_{j,t}$ 。为避免异常值影响,连续变量经过上下 1% 缩尾处理。各研究变量的符号记法与详细定义如表 1 所示。^①

表 1 研究变量定义方式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定义方式
被解释变量	<i>FEntry</i>	$\ln(1+\text{城市-行业层面新进入 FDI 企业数量})$
解释变量	<i>PubData</i>	上线公共数据平台取 1, 否则取 0
控制变量	<i>Population</i>	$\ln(\text{户籍人口数量})$
	<i>Econ</i>	地区生产总值/行政区域面积
	<i>Secondary</i>	第二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
	<i>Tertiary</i>	第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
	<i>Internet</i>	互联网接入人数/年末户籍人口
	<i>Tele</i>	电信业务收入/地区生产总值
	<i>DataCenter</i>	$\ln(1+\text{拥有工信部许可证的互联网数据中心数量})$
	<i>5GIndustry</i>	累计 5G 专利申请数量占全国累计申请数比例
	<i>Town</i>	城镇常住人口/总常住人口
	<i>Credit</i>	各类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地区生产总值
	<i>Open</i>	进出口贸易总额/地区生产总值
	<i>FPeer</i>	当地同行外企数量/全国同行外企总数
	<i>Brand</i>	“宽带中国”政策试点取值为 1, 否则为 0
	<i>SmartCity</i>	智慧城市政策试点取值为 1, 否则为 0
	<i>BigData</i>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试点取值为 1, 否则为 0
	<i>InfoService</i>	信息惠民政策试点取值为 1, 否则为 0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公共数据开放与 FDI 区位选择

表 2 展示了公共数据开放对 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本文首先在不控制其他变量和固定效应的情况下进行单变量分析。回归结果如第(1)列所示, *PubData* 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初步验证了本文假设。本文继而加入了城市-行业固定效应和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如第(2)列所示, *PubData* 的回归系数仍保持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最后, 本文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 *PubData* 的回归系数依然保持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从而印证了本文假设, 即城市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了当地 FDI 流入。以加入所有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为准, 公共数据开放导致实际 FDI 流入量增加约 5%。

^① 限于篇幅,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线上附录附表 A.1。

表 2 公共数据开放与 FDI 区位选择

变量	(1)	(2)	(3)
	<i>FEntry</i>	<i>FEntry</i>	<i>FEntry</i>
<i>PubData</i>	0.1673*** (0.034)	0.2124*** (0.051)	0.0500*** (0.015)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14302	514302	514302
R ²	0.0169	0.1370	0.2367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经城市层面聚类调整的标准误；除特殊说明外，下同。

(二)识别有效性检验

1. 事前平行趋势与动态处置效应

本文接下来对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得到的研究结论进行平行趋势检验。遵循已有研究的做法,本文以公共数据平台上线前一期为基准期。结果表明,在公共数据平台上线之前,各城市行业的 FDI 流入差异并不显著,公共数据平台上线对 FDI 流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当期及随后时期,未拒绝平行趋势假设,并表明公共数据开放确实促进了 FDI 流入。^①

2. 平行趋势假设敏感性检验

以上通过比较组间事前差异来检验平行趋势,但有研究指出在平行趋势存在一定程度偏离的前提下上述检验可能存在偏差(Biasi 和 Sarsons, 2022)。为此,本文参照 Biasi 和 Sarsons(2022)、Rambachan 和 Roth(2023)的方法,在平行趋势假设可能存在一定程度偏离的情况下对上述事件研究法的结果进行敏感性检验。具体来说,设置最大偏度 $Mbar=1\times$ 标准误,检验公共数据平台上线当期处置效应的平行趋势敏感性。本文分别进行了在相对偏离程度限制和平滑限制下处置当期的平行趋势敏感性检验,结果均显示即使平行趋势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公共数据平台上线依然具有显著的 FDI 引流效应。^②

3. 异质性处置效应检验

本文基准检验使用的模型(1)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由于时间异质性偏误可能存在“后处置组 vs 先处置组”的“坏的”对照组合,使估计结果产生偏差。为修正时间异质性处置效应带来的估计偏误问题,本文使用 Cengiz 等(2019)提供的堆叠双重差分估计量重新检验结论。堆叠 DID 将数据重构为相对事件时间的平衡面板数据,在控制群组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基础上得到处置效应的加权平均值,以此修正时间异质性处置效应带来的估计偏误。检验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平台上线之前组间事前差异并不显著,在平台上线后 FDI 引流效应显现,^③说明本文结论对异质性处置效应不敏感。此外,本文还使用了 Sun 和 Abraham(2021)、Borusyak 等(2024)的异质性处置效应检验方法^④,结果仍支持本文结论。

① 限于篇幅,事前平行趋势与动态处置效应的实证结果见线上附录附图 1。

② 限于篇幅,平行趋势假设敏感性检验的实证结果见线上附录附图 2。

③ 限于篇幅,堆叠双重差分估计的实证结果见线上附录附图 3。

④ 限于篇幅,以上两种异质性处置效应检验结果分别见线上附录附图 4 和附图 5。

(三)安慰剂检验

本文按照各城市公共数据开放时间在各年度随机抽取相同数量的城市作为伪实验组,重新进行模型(1)的回归,将此随机过程重复500次。结果表明, *PubData* 的回归系数核密度函数曲线近似均值为0的正态分布,且绝大多数回归系数对应的p值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公共数据开放促进FDI流入的结论并非随机因素驱动,本文的结论通过了安慰剂检验。^①

(四)其他稳健性测试

1. 公共数据开放的非随机问题

尽管公共数据开放由国家政策主导,但其上线时间仍可能受到非随机因素的干扰。例如,地方政府的公共数据平台上线决策可能与城市或政府固有的某些时不变属性有关,如果这些属性与FDI区位选择相关则可能干扰研究结论。鉴于此,本文首先借鉴发展经济学中的时空估计策略予以应对(Isaksson和Kotsadam, 2018)。具体来说,设计以下模型:

$$FEntry_{i,j,t} = \lambda_0 + \lambda_1 PubData_{i,t} + \lambda_2 FPubData_{i,t} + CVs_{i,j,t} + v_{i,j} + v_{j,t} + \varepsilon_{i,j,t} \quad (2)$$

其中,变量 *FPubData* 定义为当期未上线公共数据平台但在未来一期上线的地区取值为1,否则为0。由此,通过估计 λ_1 与 λ_2 之间的差异得以控制影响地方政府开放公共数据平台决策的时不变属性的影响。因此,本文关注的统计检验为 $H_0: \lambda_1 - \lambda_2 = 0$ 。回归结果表明, λ_1 显著为正且显著大于 λ_2 ,说明本文结论不受影响地方政府开放公共数据平台决策的城市或政府的时不变属性的影响。城市或政府的某些固有属性也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影响地方政府开放公共数据平台决策。为此,借鉴雷卓骏等(2023)的做法,本文在模型(1)中加入地级市虚拟变量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 *PubData* 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本文还在模型(2)中也加入地级市虚拟变量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重新进行时空估计策略的检验, λ_1 仍显著大于 λ_2 ,说明在控制影响地方政府开放公共数据平台决策的时不变属性以及城市或政府的固有属性的时间趋势演变后,本文结论依然是稳健的。^②

此外,本文进一步使用Cox风险模型,直接检验了提前期的FDI进入情况是否影响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决策。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因素,滞后一期的FDI均不显著,进一步说明政府的公共数据开放决策与FDI进入情况无关。^③

2. 匹配方法检验

本文结合倾向得分匹配和熵平衡匹配减小控制变量在处置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重新对本文结论进行检验。首先,本文采用不可放回的1:1逐年倾向得分匹配。其次,本文使用熵平衡匹配通过赋予控制组连续权重,使控制变量均值在处置组与对照组间的分布趋于相似。两种匹配方法检验下,本文结论依然成立。^④

3. 其他稳健性检验

(1)调整标准误聚类层级。相同行业内的企业群体可能存在相关性,为削弱组内自相关对统计显著性的影响,本文将标准误的聚类层级调整为行业层面,结果表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2)增加控制因素。本文进一步控制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值,一方面可以缓解遗漏变量的影响,另

① 限于篇幅,安慰剂检验的实证结果见线上附录附图6。

② 限于篇幅,公共数据开放的非随机问题的实证结果见线上附录附表B.1。

③ 限于篇幅,用Cox风险模型的实证结果见线上附录附表B.2。

④ 限于篇幅,匹配方法检验的实证结果见线上附录附表B.3。

一方面也可以缓解政府为吸引外商投资而开放公共数据平台的反向因果问题,检验结果依然支持本文结论。本文进一步地加入控制变量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即同时允许控制变量的时间趋势对被解释变量存在影响,结论依然成立。(3)更换FDI进入衡量方式。本文使用其他FDI进入的衡量方式,定义被解释变量 *FEntryGrowth* 为城市-行业层面FDI进入的当年增长率,以及 *NewFDI* 为城市-行业层面FDI进入的数量并采用泊松回归,检验结果均表明本文结论成立。(4)考虑行政区域变更。为排除行政辖区调整对研究结论产生干扰,本文剔除了发生行政辖区调整的城市,实证结果并未影响本文结论。^①

五、机制分析

以上实证结论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对FDI流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这种FDI引流效应可能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公共数据平台通过整合和提供关于当地基础设施、市场、行业、供应链、消费等经营所需信息,以一种便利且高效的方式为FDI企业提供精准全面的市场分析依据,增强其对市场的了解和预期能力,显著降低其经营性信息成本。第二,公共数据平台通过实现跨政府部门的政策整合,构建起一个透明、统一且便于利用的规则体系,从而显著降低外来企业在规则障碍及合规性审核等方面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本文对以上机制进行检验。

(一)降低经营性信息成本的机制检验

首先,不同行业的经营活动对公共数据信息的敏感性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借助这种差异进行截面测试以验证降低经营性信息成本的作用机制。借鉴Nachum和Zaheer(2005)的做法,本文根据各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信息计算各行业对信息技术的平均投资金额,金额更大的信息密集型行业对公共数据信息更加敏感。具体地,如果财务报表中无形资产的明细项包含“软件”“网络”“客户端”“平台”等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关键词,则将其视为信息技术投资。其次,根据各行业上市公司信息技术投资均值的高低将其区分为信息密集型行业和非信息密集型行业,定义虚拟变量 *InfoIntensive* 为信息密集型行业取值为1,非信息密集型行业取值为0。表3第(1)列展示了行业公共信息敏感性差异的截面测试结果,其中 *PubData* 与 *InfoIntensive*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信息密集型行业在公共数据开放后表现出更强劲的FDI流入效应,印证了公共数据开放降低经营性信息成本引流FDI的作用机制。

已有研究指出,证券分析师对上市公司的研究报告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关于当地开展业务经营所需的公共信息(Kingsley和Graham, 2017)。本文定义变量 *AnaReports* 为分析师对当地同业上市公司发布的研报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与解释变量 *PubData* 交互进行截面测试。表3第(2)列展示了截面测试结果,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分析师研报供给较少的地区,公共数据开放的FDI引流效应更显著,再次印证了降低经营性信息成本的作用机制。

本文还直接考察了公共数据开放对FDI企业实际经营的影响。具体地,本文关注FDI企业的经营范围动态。根据已有国际贸易研究,本地市场知识,如合作网络、市场偏好、要素资源与价格等,需要透明的公共信息环境支撑(Gao和Pan, 2010)。公共信息环境较好时,外商企业可以更深入地挖掘本地市场知识,开展针对性学习,从而更快速地抓住市场,形成差异化竞争力,最终推动

① 限于篇幅,其他稳健性检验的实证结果见线上附录附表B.4。

经营范围扩大(Gao 和 Pan, 2010)。如果公共数据开放降低了 FDI 企业为获取经营性信息付出的成本,则有利于 FDI 企业进行更多本地化学习和积累,扩大经营范围。为此,本文定义变量 *Sectors* 为特定城市-行业-年份新进入 FDI 企业的细分经营业务数量的均值。表 3 第(3)列展示了回归结果,公共数据开放促使新进入 FDI 企业扩展了业务范围。第(4)列表明,公共数据开放促使新进入 FDI 企业扩展业务范围在信息密集型行业更加显著。

(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机制检验

海外投资者通常会主动通过与当地政府建立亲密关系,以提高对行政监管制度规则的适应性(King, 2015)。为检验公共数据开放降低 FDI 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机制,本文借鉴彭远怀和胡军(2024)等,使用市场化进程指数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得分进行截面测试。得分越低,说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多,FDI 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通常越高。如果公共数据开放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机制引流 FDI,则引流效应应在得分越低的地区越显著。本文定义变量 *Gov* 为“政府与市场关系”,得分超过均值取值为 1,否则为 0。表 3 第(5)列展示了回归结果,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印证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作用机制。

本文直接考察了公共数据开放对 FDI 企业实际受到行政处罚的影响。行政处罚是政府部门针对违反制度规则行为实施的制裁措施,是市场主体对政府规则适应能力的重要体现。企业受到行政处罚越多,意味着其对制度规则的适应能力越差,付出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越高。如果公共数据开放降低了 FDI 企业遭受行政处罚的概率,则说明 FDI 企业适应制度规则的能力得以提高,付出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本文定义变量 *Punish* 为特定城市-行业-年份 FDI 企业遭受行政处罚的平均次数。表 3 第(6)列展示了回归结果,*PubData*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再次印证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作用机制。

表 3 机制检验:降低经营性信息成本与制度性交易成本

变量	(1)	(2)	(3)	(4)	(5)	(6)
	<i>FEntry</i>	<i>FEntry</i>	<i>Sectors</i>	<i>Sectors</i>	<i>FEntry</i>	<i>Punish</i>
<i>PubData</i>	0.0050 (0.014)	0.0510*** (0.014)	0.2575* (0.143)	0.1489 (0.146)	0.0558*** (0.015)	-0.0071* (0.004)
<i>PubData</i> × <i>InfoIntensive</i>	0.2707*** (0.067)			0.3735*** (0.135)		
<i>PubData</i> × <i>AnaReports</i>		-0.0623** (0.028)				
<i>AnaReports</i>		0.1671*** (0.026)				
<i>PubData</i> × <i>Gov</i>					-0.0535* (0.028)	
<i>Gov</i>					0.0067* (0.004)	
控制变量及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14302	514302	64084	64084	514302	514302
R ²	0.2408	0.2442	0.2665	0.2667	0.2368	0.0174

六、进一步研究

(一) 外资进入模式的进一步分析^①

1. 公共数据开放与FDI进入的股权模式

独资企业(Wholly Owned Enterprise, WOE)和股权合资企业(Equity Joint Venture, EJV)是两种较受欢迎的FDI进入模式(Wei等, 2005)。截至20世纪末, WOE占据中国FDI进入的主要形式, 此后逐渐被EJV大幅赶超(Deng, 2001), 说明中国吸引FDI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实质上, WOE和EJV两种模式代表了不同的内部化程度, WOE的内部化程度较EJV更高。本文认为, 公共信息环境的优化可能是对中国FDI进入股权配置模式巨变的一种重要解释。

具体来说, 在EJV模式下, 本地合作伙伴通常会向外资企业提供其对当地市场和政府规制的了解, 以及资源网络和社会资本, 帮助外资企业快速适应市场(Deng, 2001)。而在WOE模式下, 外资企业需通过自身努力积累本地知识和建立关系网络(Pan, 1996), 包括与政府、供应商和客户的互动, 这对了解当地的商业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独资模式通常意味着更大的资本投入和长期的市场布局, 这要求外资企业对东道国市场的稳定性、增长潜力以及经济环境有清晰认识, 并基于对本地知识的掌握进行前瞻性规划。因此, WOE模式对外商的自主能力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而这些能力的关键在于对东道国当地公共信息的广泛可获得性。因此, 公共信息环境的变化可能有助于解释FDI进入时在WOE和EJV之间的选择。

本文统计了新进入FDI企业中WOE模式的占比, 记为变量 $WOERatio$ 。实证结果表明, $PubData$ 与 $WOERatio$ 显著正相关, 公共数据开放促使了更多外商以WOE模式进入国内, 说明公共信息环境的不断优化是解释中国FDI进入股权配置模式变化的重要原因。

2. 公共数据开放与FDI同行集聚效应

集聚是海外投资企业获得当地公共信息的重要战略选择(Tan和Meyer, 2011)。通过与同一行业的其他外商企业集聚, 进入者可以获得当地特定行业的知识, 如当地客户和供应商行为的信息(He, 2002)。这种知识通常是隐性的, 在集聚的背景下, 地理上的接近促进了这种知识的交流, 外企之间可以通过频繁互动和高效沟通来促进当地公共信息的转移、理解和吸收(Tan和Meyer, 2011)。然而, FDI企业的行业集聚也可能导致更高的成本。首先, 行业集聚加剧了对稀缺资源的竞争,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商企业迁入同一地区, 它们对工人、土地和公用事业服务等生产性投入的竞争加剧, 推高了这些投入的价格(Folta等, 2006)。其次, 海外优秀竞争对手的集聚增加了依靠私有生产或服务技术获取利润的难度, 包括面临更直接的竞争压力和海外同行更强的技术吸收能力等(Chung和Alecacer, 2002)。因此, 政府公共数据开放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了解当地知识的正规制度渠道可能会减弱外商集聚的外部性优势及集聚动机。

本文实证发现, $PubData$ 与同业集聚程度 $FPeer$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公共数据开放显著抑制了新进入FDI企业同业集聚倾向。该研究表明, 东道国当地公共信息环境对FDI企业选址的同业集聚考虑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有助于对中国FDI企业同业集聚的变化趋势做出解释。

(二) 公共数据开放质量与FDI区位选择

根据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发布的《报告》, 中国不同城市的公共数据开放质量呈现较

^① 限于篇幅, 外资进入模式进一步分析的实证结果见线上附录附表C.1。

大差异,本文进一步探究质量差异是否影响了FDI引流效应。借鉴彭远怀和胡军(2024)、沈坤荣和林剑威(2025),本文利用《报告》提供的中国开放数林综合指数衡量开放质量 *Quality*^①。公共数据开放的质量不仅取决于数据本身的质量,还受到平台质量和政府政策保障力度的影响(彭远怀、胡军,2024)。本文根据《报告》中提供的不同质量维度,分别根据数据质量、平台建设质量和政策保障质量三个维度的质量标准检验对开放质量FDI引流效应的差异影响。其中,数据质量以数据层指数 *Data* 衡量,该指数是对数据数量、范围及可接入性等方面的评价;平台建设质量以平台层指数 *Platform* 衡量,该指数是对平台体系、服务能力及用户体验的综合反映;政策保障质量以准备度指数 *Policy* 衡量,该指数综合反映了政府部门有关公共数据开放的法规政策和组织推进。^②

实证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质量越高,FDI引流效应越显著,提高公共数据开放质量有助于中国吸引和稳定外商投资。此外,分维度的实证结果表明,*Data*、*Platform* 和 *Policy*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开放数据质量越高、平台建设越完善、政策保障力度越强,FDI引流效果越好。由此可见,充分发挥公共数据开放的吸引和稳定外资作用需要在开放数据质量、平台建设和政策保障多维度并头推进。^③

(三)公共数据开放对东道国区位优势增益作用

如上文理论分析所示,东道国公共信息环境是影响区位优势转化的重要因素。本文研究结论进一步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带来的公共信息环境优化吸引了FDI进入,这种引流作用可能蕴含了外商投资者对区位优势的更强转化。换句话说,公共数据开放可能对东道国既有的区位优势吸引FDI具有增益作用,无论区位优势是资源型的还是制度型的。

获取海外市场资源是FDI的重要战略目的(Meyer等,2009)。本文以市场潜力为例分析公共数据开放对东道国资源型区位优势增益作用。公共数据开放有助于外商能够更好地了解当地公共信息,扫除开拓海外市场的信息阻力,从而增强庞大市场潜力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借鉴韩峰和柯善咨(2012),本文计算反映市场潜力的变量 *Market*,考察其与 *PubData* 的交互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公共数据开放增强了市场潜力对FDI的吸引力。除了寻求海外市场,对于依赖私有先进技术赚取海外利润的外商投资者,当地的知识产权制度无疑是重要的(Globerman和Shapiro,2003)。本文以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例,分析公共数据开放对东道国制度型区位优势增益作用。本文定义变量 *PRP* 为该城市是否被列入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试点,被列入时取值为1,否则为0。实证结果表明,*PubData*×*PRP*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公共数据开放的公共信息环境优化作用增强了知识产权制度对FDI的吸引能力。^④以上的研究结论说明,发展中国家通过统筹设计且运行良好的公共信息制度有助于其既有区位优势更好地发挥吸引和稳定外资的作用。^⑤

七、结论与启示

扎实推进外资“保稳促优”、推动吸收外资实现规模扩大、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对我国构建开

① 更多介绍请参见中国开放数林指数网(ifopendata.fudan.edu.cn)。由于此处使用的相关数据最早于2018年开始提供,此处的分析同样始于2018年。

② 在正式实证检验前,本文对以上变量进行了信度、效度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信度、效度均符合要求。限于篇幅,详见线上附录附表D.1。

③ 限于篇幅,公共数据开放质量与FDI区位选择的实证结果见线上附录附表D.2。

④ 由于部分县级市较早加入政策试点,而本文对地级市层面进行分析,因此将相关地级市予以剔除。

⑤ 限于篇幅,公共数据开放对东道国区位优势增益作用的实证结果见线上附录附表E.1。

放型经济体、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了公共数据开放政策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作用,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平台开放有效促进了FDI流入,并且其主要机制在于公共数据开放优化了公共信息环境,降低了FDI企业的经营性信息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公共数据开放综合质量越高,对FDI的引流效应就越强。区分质量维度看,开放数据质量越高、平台建设越完善、政策保障力度越强,引流效应也越好。本文对更多的进入维度进行了研究,发现公共数据信息可获取后,外商增加了以独资(而非合资)进入的倾向,说明公共数据开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商对东道国合作投资的依赖。而且公共数据开放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同行外商企业的集聚倾向,说明公共数据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FDI企业从同行集聚中学习当地公共信息的替代信息源。此外,本文分析了公共数据开放对东道国区位优势增益作用,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对东道国的资源型和制度型区位优势都具有增益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有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第一,提出了“数字经济时代外资国民待遇”的新内涵和“信息赋能型外资政策”的新范式。本文的研究表明,公共数据开放作为数字时代的制度产物,其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对本地经济体及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还通过降低外资企业在当地获取公共信息的门槛吸引了更多FDI流入。除了直接的引流效应,公共数据开放对当地区位优势具有增益作用。过去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政策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效,努力使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本文提出,公共信息环境的制度建设也是使外资企业享受平等国民待遇的重要政策方向。根据本文研究,未来可从开放数据内容、平台建设和政府政策安排等方面着力提高公共数据开放质量,充分发挥其改善公共信息环境以吸引外资的战略价值。在数据内容方面,扩大数据覆盖范围,确保基础设施、市场、行业、供应链、消费和政府规制等关键领域的完整实时;在平台建设方面,打造跨部门、跨区域的互联互通数据平台,提供便捷的API接口和可视化工具,增强数据可机读性,提升调用效率,优化使用体验;在政策保障方面,健全公共数据开放的法律法规与实施细则,通过绩效考核、财政激励等方式,确保数据开放与平台稳定、安全与可持续运行,为外资企业提供稳定可信赖的信息服务。

第二,本文的研究表明,公共数据开放是一种通过信息放权规范政府行为、强化政府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一种促进公平竞争、改善营商环境的关键制度安排,对规范政府行为和构建稳定、可信的政企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未来的公共数据开放制度建设应当更加注重政府在数据开放过程中的规范性、及时性和公平性。具体来说,可遵循“非敏感数据默认开放”的原则,制定全国或符合区域特色的“公共数据开放名录”,减少政府部门公共数据开放的裁量权力。其次,建设工作流平台,制定流程化的“数据下沉—审核—上线”链条,让业务部门“一键化”提交数据,数据管理部门自动化校验元数据合规性并进行安全审查,通过后即在公共平台上线。最后,在政府内部构建监管与问责体系,对重点领域公共数据实施监察整改。

第三,本文揭示了公共信息环境优化下FDI进入中国的微观策略转变,能够为外资政策提供诸多新启示。首先,公共信息环境的不断优化使FDI企业更多以独资而非合资的方式进入,可由行业主管部门牵头,鼓励海外独资企业参与国家重点实验室或承担开放实验室项目,或加强它们与本地科研院所的联合,增强本地对FDI企业先进能力的吸收和转化。其次,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改变外资企业的空间选择,作为政策杠杆,政府可通过打造有针对性的公共数据生态引导外资向特定区域或产业定向流入,增强对地方产业链和创新网络的引导能力,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与产业高质量增长。

参考文献:

1. 陈继勇、盛杨怿:《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
2. 陈六傅、刘厚俊:《国际资本流动的卢卡斯悖论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3期。
3. 陈艳利、蒋琪:《数据生产要素视角下开放公共数据与企业创新——基于建立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准自然实验》,《经济管理》2024年第1期。
4. 狄嘉、孙朋飞、苑春荟、李晓龙:《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创业活跃度——基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年第1期。
5. 方锦程、刘颖、高昊宇、董纪昌、吕本富:《公共数据开放能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来自政府数据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管理世界》2023年第9期。
6. 韩峰、柯善咨:《追踪我国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来源:基于马歇尔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的综合视角》,《管理世界》2012年第10期。
7. 蓝发钦、胡晓敏、徐卓琳:《公共数据开放能否拓展资本跨区域流动距离——基于异地并购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24年第9期。
8. 雷卓骏、黄凌云、张宽:《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与城乡收入差距》,《财贸经济》2023年第5期。
9. 欧阳伊玲、王愉靖、李平、高昊宇:《数据要素与城投债定价:基于公共数据开放的准自然实验》,《世界经济》2024年第2期。
10. 彭远怀、胡军:《政府数据开放与资本区际流动:企业异地投资视角》,《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年第10期。
11. 沈坤荣、林剑威:《“链岛”成“陆”:公共数据开放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管理世界》2025年第2期。
12. 王海、叶帅、尹俊雅:《公共数据开放如何提振企业有效投资——基于产能利用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24年第8期。
13. 叶永卫、余田田、陶云清、陈建兴:《政府数据要素共享的稳投资效应:来自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证据》,《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5年第1期。
14. Ahearn, A. G., Grier, W. L., & Warnock, F. E., Information Costs and Home Bias: An Analysis of US Holdings of Foreign Equit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62, No.2, 2004, pp.313–336.
15. Alfaro, L., Kalemli-Ozcan, S., & Volosovych, V., Why Doesn't Capital Flow from Rich to Poor Countri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90, No.2, 2008, pp.347–368.
16. Biasi, B., & Sarsons, H., Flexible Wages, Bargaining, and the Gender Gap.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37, No.1, 2022, pp.215–266.
17. Borusyak, K., Jaravel, X., & Spiess, J., Revisiting Event-Study Designs: Robust and Efficient Estima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91, No.6, 2024, pp.3253–3285.
18. Cengiz, D., Dube, A., Lindner, A., & Zipperer, B., The Effect of Minimum Wages on Low-Wage Job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34, No.3, 2019, pp.1405–1454.
19. Chung, W., & Alcácer, J., Knowledge Seeking and Location Choi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agement Science*, Vol.48, No.12, 2002, pp.1534–1554.
20. Deng, P., WFOEs: The Most Popular Entry Mode into China. *Business Horizons*, Vol.44, No.4, 2001, pp.63–72.
21. Dunning, J. H.,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1.
22. Dunning, J. H., 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 Restatement and Some Possible Extens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19, No.1, 1988, pp.1–31.
23. Dunning, J. H., 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N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 In Ohlin, B., Hesselborn, P. O., & Wijkman, P. M. (eds.), *The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London: Macmillan, 1977, pp.395–418.
24. Filatotchev, I., Strange, R., Piesse, J., & Lien, Y.C. FDI by Firms from Newly Industrialised Economies in Emerging Markets: Corporate Governance, Entry Mode and Loc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38, No.4, 2007, pp.556–572.
25. Folta, T. B., Cooper, A. C., & Baik, Y., Geographic Cluster Size and Firm Performanc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Vol.21, No.2, 2006, pp.217–242.
26. Gao, G. Y., & Pan, Y., The Pace of MNEs' Sequential Entries: Cumulative Entry Experience and the Dynamic Proces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41, No.9, 2010, pp.1572–1580.
27. Globerman, S., & Shapiro, D., Governance Infrastructure and U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34, No.1, 2003, pp.19–39.

28. Goldstein, I., & Razin, A., An Information-Based Trade off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Foreign Portfolio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70, No.1, 2006, pp.271–295.

29. Harding, T., & Javorcik, B. S., Roll out the Red Carpet and They Will Come: 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FDI Inflow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121, No.557, 2011, pp.1445–1476.

30. He, C., Information Costs,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Regional Studies*, Vol.36, No.9, 2002, pp.1029–1036.

31. Isaksson, A.S., & Kotsadam, A., Chinese Aid and Local Corrup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159, No.1, 2018, pp.146–159.

32. Javorcik, B. S., Özden, Ç., Spatareanu, M., & Neagu, C., Migrant Network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94, No.2, 2011, pp.231–241.

33. King, M. R., Political Bargaining and Multinational Bank Bailou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46, No.2, 2015, pp.206–222.

34. Kingsley, A. F., & Graham, B. A. T., The Effects Of Information Voids on Capital Flows in Emerging Marke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48, No.3, 2017, pp.324–343.

35. Lucas, R. E., Why Doesn't Capital Flow from Rich to Poor Countries?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0, No.2, 1990, pp.92–96.

36. Makhija, M. V., & Stewart, A. C.,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ontext on Perceptions of Risk: A Comparison of Planned Versus Free-Market Manag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33, No.4, 2002, pp.737–756.

37. Mariotti, S., & Piscitello, L., Information Costs and Location of FDIs within the Host Countr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Ita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26, No.4, 1995, pp.815–841.

38. Meyer, K. E., Estrin, S., Bhaumik, S. K., & Peng, M. W., Institutions, Resources, and Entry Strategi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30, No.1, 2009, pp.61–80.

39. Nachum, L., & Zaheer, S., The Persistence of Distance?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MNE Motivations for Foreign Invest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26, No.8, 2005, pp.747–767.

40. Pan, Y., Influences on Foreign Equity Ownership Level in Joint Ventures in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27, No.1, 1996, pp.1–26.

41. Rambachan, A., & Roth, J., A More Credible Approach to Parallel Trend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90, No.5, 2023, pp.2555–2591.

42. Slemrod, J., Are Corporate Tax Rates, or Countries, Converging? .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88, No.6, 2004, pp.1169–1186.

43. Sun, L., & Abraham, S., Estimating Dynamic Treatment Effects in Event Studies with 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225, No.2, 2021, pp.175–199.

44. Tan, D., & Meyer, K. E., Country-of-Origin and Industry FDI Agglomeration of Foreign Investors in An Emerging Econom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42, No.4, 2011, pp.504–520.

45. Wei, Y., Liu, B., & Liu, X., Entry Mode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A Multinomial Logit Approach.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Vol.58, No.11, 2005, pp.1495–1505.

46. Yang, J. Y., Kim, M., Li, J., & Lu, J. W., Information Voids and Cross-Border Bandwagon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o an Emerging Econom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44, No.11, 2023, pp.2751–2782.

47. Yao, F. K., Xie, L., Li, J., & Xu, M., Subnational-Level Government Influence and FDI Location Choices: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Resource Dependence Rel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54, No.6, 2023, pp.1027–1054.

Information Void Bridging and FDI Location Distribution

LI Sihai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430073;

West Yunna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671000)

LI Zhe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430073)

Summary: Understanding the determinants of FDI location choice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continuous effort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FDI inflow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public data openness on FDI location choice by using foreign business registration data from more than 450 subsectors in 28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The study shows that public data opennes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FDI inflows primarily by reducing the operational information cost and institutional transaction cost of FDI enterprises. This mitigates the public information disadvantage faced by these enterprises. After public data openness, FDI firms expand their operational activities in China and face a lower probability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The study also shows that higher data quality, better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stronger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 for public data openness enhance its FDI attraction effect.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public data openness changes the equity configuration and spatial choice of FDI entry. Specifically, it encourages FDI firms to enter as sole proprietors (rather than joint ventures) in terms of equity mode, and reduces the tendency of peer agglomeration. Finally, the study shows that public data openness attracts FDI beyond its direct benefits; it also reinforces the attractiveness of local resource-based and institutional location advantages.

This study makes several contributions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First, this paper incorporates the quality of the public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into the framework for explaining the Lucas paradox and identifying key factors in attracting FDI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providing direct causal evidence from the world's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It propose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equal treatment for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and a new paradigm for "information-empowered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ies." Second, this paper expands research on the micro-level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of foreign investment entry by analyzing foreign firms' entry modes and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Third,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regulating government behavior through inform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 governance are key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promoting foreign investment inflows, with China's public data openness as a clear example.

Keywords: Public Data Openness, Public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Entry Mode

JEL: D80, F23, P33

责任编辑:诗 华